

四川省博物館

THE SICHUAN PROVINCIAL MUSEUM



四川省博物館

四川省博物館編

文物出版社

四川省博物馆馆名题字：邓小平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曹 流

四川省博物馆

四川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京百花印刷厂制版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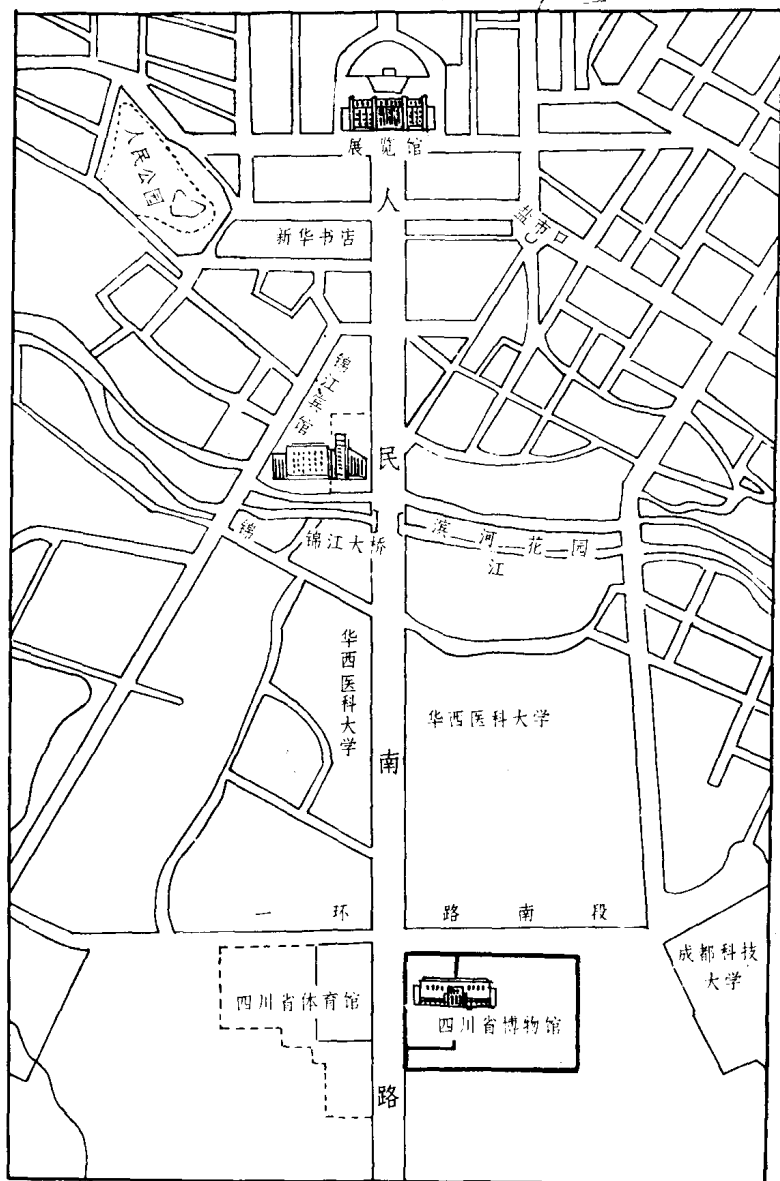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开 印张：2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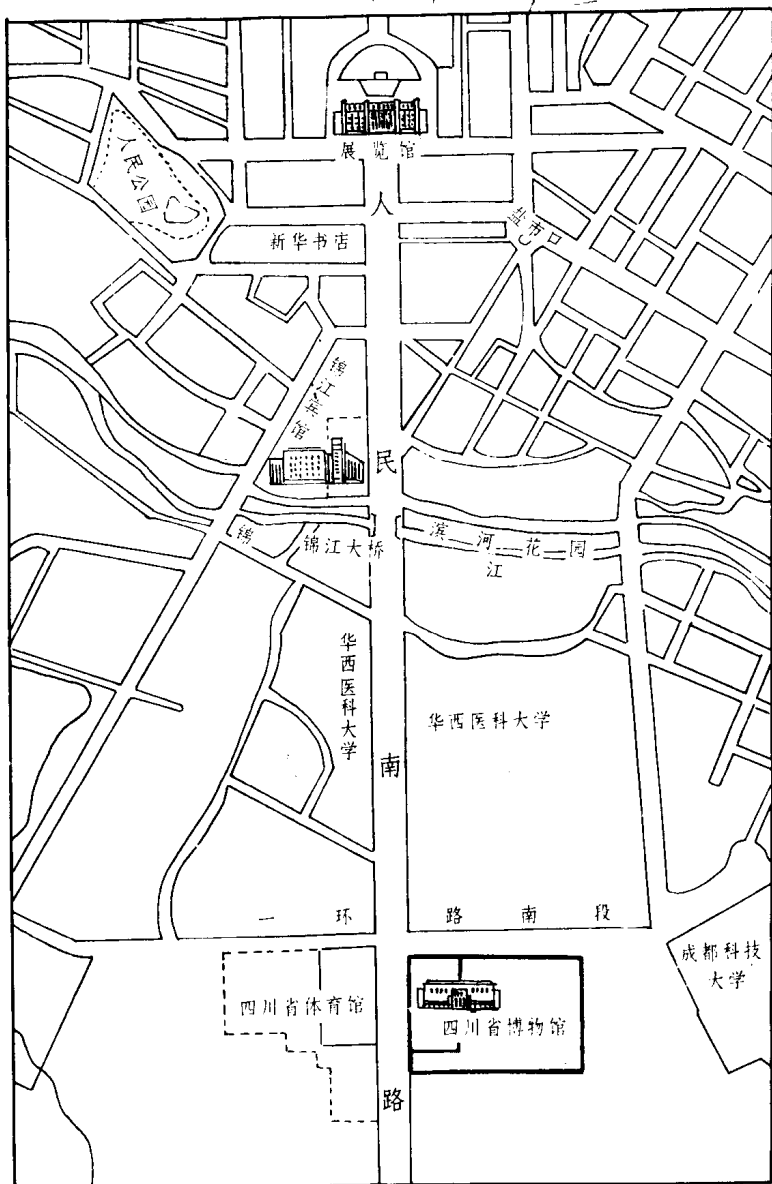
书号：7068·1647 定价：0.88元

ISBN 7-5010-0163-3/G·11



四川省博物馆位置图

FH148/03



四川省博物馆位置图

四川省博物館

四川省博物館編

文物出版社

四川省博物馆馆名题字：邓小平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编辑：曹 流

四川省博物馆

四川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京百花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开 印张：2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7068·1647 定价：0.88元

ISBN 7-5010-0163-3/G·11

四川省博物馆概况

素享“天府”盛誉的四川省，拥有秀丽的山川和辽阔的沃土。遍布各地的名胜古迹和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反映着四川历史的发展进程，它是我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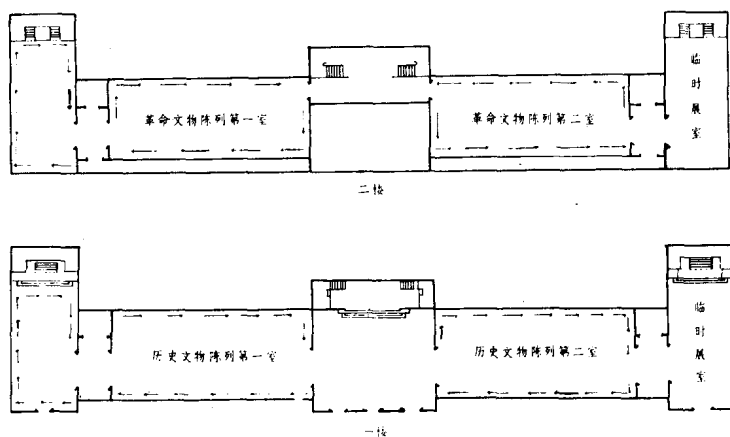
四川省博物馆便是收藏和展出四川省文物的重要场所之一。

四川省博物馆初建于1941年，时称四川博物馆。创办伊始，设备简陋，经费不敷开支，专业人员甚少，直至1949年底，全部藏品仅近万件。

解放初期，该馆更名为川西博物馆，1952年定名四川省博物馆。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建设，现已初具规模，全部藏品达十六万件之多。

四川省博物馆是一座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性省级历史博物馆。在过去的四十年内，该馆曾发掘、清理了数以千

计的古代遗址和墓葬。目前这里除经常陈列展出三千三百多件古代和近、现代文物外，还举办各种临时性或纪念性的专题展览。通过这些陈列展览对群众进行生动形象的历史知识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人们从中了解四川历史发展简况和地方文化的特征。



展厅陈列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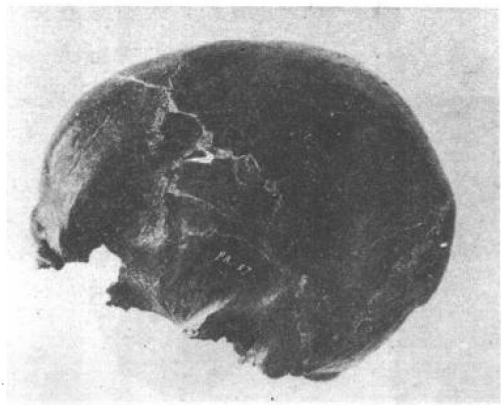
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描绘了四川山势的险峻和古代交通的不便，但它并不说明四川从来就是一个文化落后的荒漠边陲。

1951年，资阳黄鳊溪发现的一具人头骨化石(图一)，揭开了四川远古历史的篇章。“资阳人”头骨化石被多数专家认为属更新世晚期的遗存。这一发现说明，很可能早在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四川的土地上已有人类繁衍生息。

此后，在汉源富林镇、铜梁西廓水库和资阳鲤鱼桥等地先后出土了打制石器、古生物标本与化石。它们使四川省博物馆旧石器时代文物的收藏和陈列更加丰富多彩。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石器采集地点，遍及全川，迄今已发现三百处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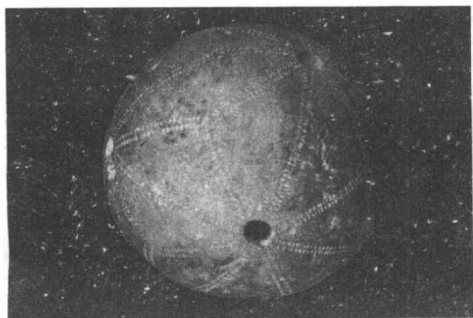
图一 资阳人头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
资阳出土

滚滚长江，数千年来以其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人民。1959年在川东长江流域发现的巫山大溪遗址，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四川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它的发现时间最早，故以后广泛出土于湖北、湖南长江流域的同类文化遗存，均被称为大溪文化类型。

通观大溪遗址出土的一千二百五十余件石器、陶器、骨器和玉器，可知大溪文化自成体系，别具特色。如穿孔石铲、圭形石凿刀和精美的红陶器等，不仅表现出独特的形制和风格，而且显示出较高的制作水平。

一件直径约3厘米的红陶空心球(图二)，堪称大溪文物中的精品。大溪的工匠们，在十分光滑规整的红陶球面上戳刺出无数圆点，圆点相联成线，这些线条把整个球面分成若干对称而均等的三角形和扇形，表现了五千年前人们原始的几何学、数学观念。它是大溪文物中的一件带有玩具性质的工艺品。

图二 红陶空心球
大溪出土



图三 人面形石佩
大溪出土



人面形石佩(图三)，是在一块椭圆形天然黑色石块上的正、背两面雕刻出人的面型；脸庞上的眼、鼻、口皆清晰可辨，形象逼真，妙趣横生；手法简练娴熟，风格粗犷朴实。这一人面形器与甘肃永昌、山东藤县出土的人面形器相比，有其相似之处，但大溪的人面形器在用料和表现手法上皆有独到之处，其制作技艺则更高超。

大溪遗址出土的彩陶器，无论从其形制或纹饰看，均表现出与仰韶文化的密切关系。彩陶瓶(图四)形似河南浙川和西安半坡出土的同类器物，而彩陶罐(图五)等器物上的三角、花瓣纹又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具有相似的风格。大溪的黑陶器(图六)与龙山文化的联系也十分显著，而从大溪的灰陶器中又可发现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相承关系。

大溪遗址共清理墓葬二〇七座。其丧习也较有特色。葬式有屈肢、仰身直肢，而以屈肢葬最有代表性。结合各墓随葬品的品种和多寡，可



图四 彩陶瓶
大溪出土

图五 彩陶罐
大溪出土





图六 黑陶曲腹杯
大溪出土

知大溪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兴盛时期和向父系氏族的过渡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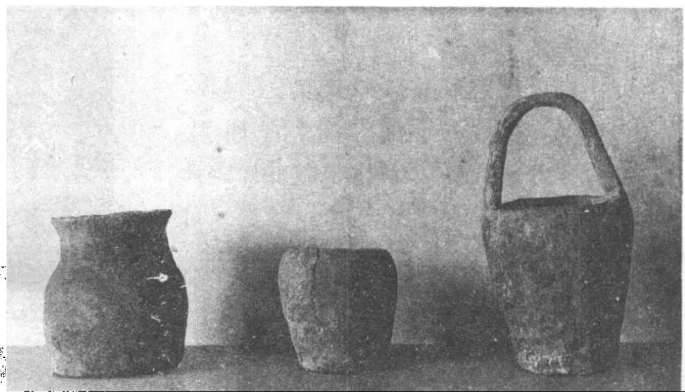
从大溪遗址出土的石锄、蚌镰和彩陶上的谷物纹饰看，农业已有一定发展；从其文化层出土的兽骨、鱼骨、鱼钩和用鱼、狗作殉葬物的情况看，渔猎和放牧业更占有重要地位；而纺轮等物的出土，说明大溪人已能从事纺织了。

川东长江流域的忠县曾井沟和川西金沙江流域的西昌礼州，也都发现过较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曾井沟的角状尖底杯具有地方特色，礼州的手捏灰陶桶形器(图七)、半月形石刀等则不仅具有地方风格，而且表现出与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器物有密切联系。

图七

手捏灰陶器

西昌礼州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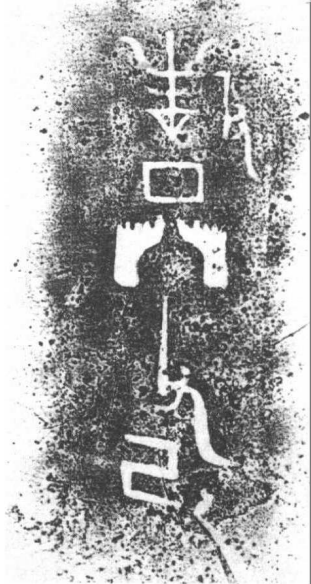
殷 周 文 物

殷周时期，四川生活着巴和蜀两个较大的部族。巴人活动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蜀人生活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巴蜀文化”。

据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商代的蜀人与殷王朝的关系是：时而臣服，时而反抗。新繁（今新都县）水观音出土的铜镞、铜矛、铜斧等，皆与中原出土的同类兵器相似，尤其是铜戈与中原出土的殷商时代勾兵器酷似，具有形小、器薄、制作较粗等特点。

1959年和1980年，先后在彭县竹瓦街发现了两个殷周青铜器的窖藏。容器中的罍、尊、觶等，在形制和纹饰等方面皆与殷器相似，而两件铜觶的内底铭刻着金文，分别为“羌(羊)父癸”和“牧正父己”（图八、九），它全然属于中原的产品。在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龙凤纹铜罍（图一〇），其盖饰为立体昂首蟠龙，肩部装饰羊头。它的形制、纹饰皆与1973年辽宁喀左县出土的一件蟠龙兽面罍酷似。由此可以证明祖国南北文化的紧密联系。

竹瓦街的青铜器中多数器物的器表光泽度较差，铜色显得略淡于中原产品。而各种器物上出现的云雷、饕餮、夔纹等纹饰往往排列得不够自然，繁缛而拥挤，甚至偶有纹样倒置者。但有的纹样显示出组合上的独特意趣，颇具



图八、九 殷周“牧正父己”铜觶及内底铭文(拓片)
彭县出土



图一〇 龙凤纹铜罍
彭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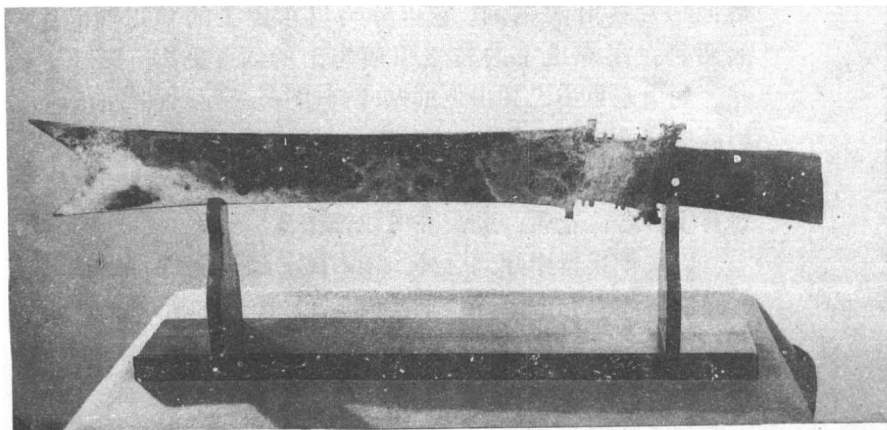
地方色彩。如钺上的牛头纹、矛和戟上铸的鸟纹等，都是蜀地特有的青铜器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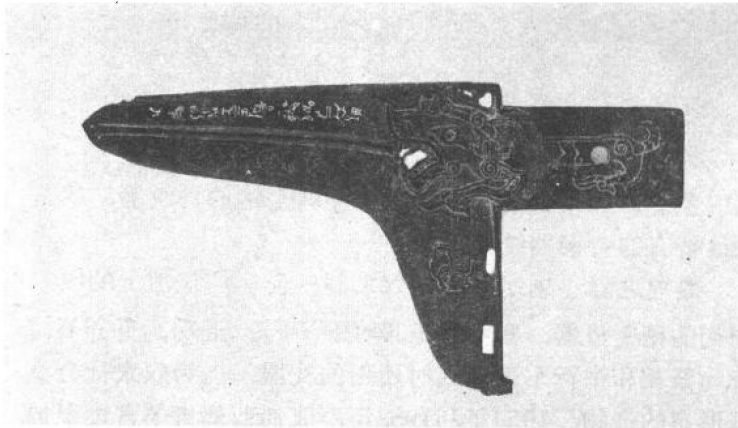
殷周之际，蜀地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广汉出土的殷末周初的精美玉器，其中有玉璋（图一一）、玉琮、玉斧等，皆为祭祀和举行军事仪式时所用的礼器，当为奴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1954年和1958年，成都西郊青羊宫发现的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虽无文字，却有烧灼后形成的纹路。

战国时期，中原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四川却仍然存在着巴、蜀两个奴隶制国家。全川范围内发现战国墓葬数量很多，出土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反映了“巴蜀文化”已进入繁盛时期。

在四川的战国青铜器中，以铜兵器、生产工具和铜印章等最有特色。这些器物身上往往铸有虎纹、夔龙纹、兽面饕餮纹、鸟纹、蝉纹、人形纹、蛇纹、蛙纹、蚕纹、蜂纹、

图一一 玉 璋
广汉出土





图一二 战国铭文铜戈 郫县出土

船载旗鸟纹、蟠螭纹以及手、心、花蒂纹等。纹饰新颖别致，内容丰富多样，被不少学者称为“巴蜀图语”，认为是古代巴蜀的图案或含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在郫县、万县、新都 and 涪陵等地分别发现的四件战国铜戈(图一二)上，皆刻有一行符号；经专家鉴定，这些符号可能是古代的地方文字，但至今尚不能辨认。

战国时期，巴蜀铜兵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则属柳叶形剑。巴蜀式柳叶剑，全川战国墓内皆有出土，其形制是国内出土的同一时期铜剑中罕见的。所谓柳叶剑是一种无剑格、形似一片柳叶的铜剑。它可分为川东出土的和川西出土的两种。川东出土的较之川西出土的剑身更长、更厚一些。如川东重庆巴县出土的柳叶剑(图一三)，长62厘米，川西成都西郊出土的柳叶剑(图一四)，长41.7厘米。剑身上往往铸有精美的花纹；剑脊两侧铸有虎斑纹；剑基部位铸有手、心、花蒂、虎、鸟等纹饰图案。

巴蜀铜兵器中除剑之外，还有钺；钺较剑更为普遍。空心铜钺(图一五)俗称“烟荷包”，形似民间所用圆形或